我国金融安全测度与预警文献综述

我国金融安全的研究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多年来国内学者在金融安全的概念、金融安全的测度以及金融安全的预警方面进行了诸多研究。而国际学者尤其是欧美研究者则少有关于金融安全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对金融稳定这一概念的研究。

一、金融安全概念研究回顾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研究者开始重视金融安全问题，而研究金融安全问题的首要前提是厘清金融安全的概念。王元龙最早（1998）对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内涵进行了阐述，认为金融安全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也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梁勇（1999）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界定，认为金融安全是对“核心金融价值”的维护，“核心金融价值”首先是金融本身的核心价值，表现为金融财富安全、金融制度的维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正常运行与发展；其次是受金融因素影响国家的核心价值，表现为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安全受金融因素影响程度；最后是国际金融运行中本国的“金融价值”，除了避免金融财富外流、外来冲击危及国内金融制度与体系进而危及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外，主要是控制金融体系的力量保持对国内金融运行和金融发展的控制。总的来说，梁勇(1999)认为国家金融安全是指一国能够抵御内外冲击保持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即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本国金融及经济不受重大损害，如金融财富没有大量流失、金融制度与金融体系基本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状态，维护这种状态与能力和对这种状态与维护能力的信心与主观感觉，以及这种状态和能力所获得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安全。

郑汉通（1999）认为金融安全即是指一国金融利益不受侵犯，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不受破坏和威胁，金融体系能抵御各种金融危机对其的侵害。反之，当一国金融利益受到侵犯，金融体系不能正常运转，面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毫无抵抗能力，就是金融不安全。雷家骕（2000）认为金融安全主要指金融领域能够通过利用各种手段抵御和消除来自内部和外部各种威胁和侵害，以确保正常金融功能和金融秩序。

刘沛和卢文刚（2001）回顾了国内外金融安全概念的研究，发现国外学者未对金融安全概念进行界定，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将金融安全看作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的一部分，刘沛和卢文刚（2001）认为金融安全是指一国经济独立发展道路上，金融运行的动态稳定状况。并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提出了7点说明：首先，提出金融安全状态的前提是经济主权独立，若一国经济发展受制于其他力量主体，则金融安全无从谈起。其次，对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认为金融安全并非金融风险的反义词，金融风险是指金融资产损失和盈利的可能性，伴随在一切金融活动中，不一定导致金融不安全，若金融风险得到较好控制则在风险中也有安全态势。第三，认为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均衡状态，金融安全状态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外金融环境能够动态应对，且由于经济运行具有惯性和周期，金融安全应是基于信息完全和对称及其反馈机制和应激机制良好的运行基础上的动态均衡。第四，认为金融安全分为广义和狭义，狭义金融安全指针对金融和货币领域的动态均衡，广义金融安全则指在拥有国家主权前提下，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动态均衡。第五，认为金融危机爆发并非金融安全的反义词，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积累至爆发的结果，并不是金融不安全就会导致金融危机。第六，认为金融安全是特定意义上的金融稳定，金融稳定侧重于静态的概念而金融安全则侧重于动态发展态势。第七，认为金融安全观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作为重要战略提出的，金融安全的提出与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概况与实践有密切关系，不是纯经济或金融学概念而是多学科的综合成果。

符莉（2002）认为金融安全包括多方面的内容，首先是金融体系的安全，如金融资产的安全、金融机构的安全；其次是金融发展的安全，如对整体经济和军事、政治安全起决定性作用的金融运行的安全；再次是金融自控权的不受侵犯。衡量标准主要包括：无明显金融风险、无重大金融财产实际损失、金融市场稳定、金融机构健全、金融运行有序、金融监管主动有效、整个金融业稳健发展、未因客观经济金融因素使金融政策偏离既定目标、金融的运行未对经济政治军事等安全造成负面影响。

王元龙（2004）对金融安全研究中的多个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回顾了以往研究中金融安全的定义后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以王元龙（1998）为代表从金融实质的角度界定，另一种以梁勇（1999）为代表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王元龙（2004）认为金融安全的概念可进一步界定为：金融安全是指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主权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

刘锡良（2004）从金融功能正常运转的角度对金融安全进行了定义，将金融安全分为了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微观层面是指金融企业个体角度，中观层面是指整个金融行业， 而宏观层面则从整个经济体出发。吴婷婷（2011）认为金融安全是指金融体系的风险承载力不但能应对系统自身内部风险的集聚，还足以抵御来自国际金融领域的外部冲击；金融安全是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过程中的一种“动态”安全，而非“静态”的安全。

顾海兵（2011）同样遵循王元龙（2004）的看法，认为以往研究中金融安全的定义基本属于王元龙（2004）提出的两类观点的范畴，或是将两类看法综合在一起。顾海兵（2011）认为以往研究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对金融安全内涵理解的泛化，认为凡是威胁到国家金融稳定的因素或是与金融活动相关的因素都属于国家金融安全问题的研究范畴。这类定义将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金融稳定等定义混同使金融安全研究缺乏明确的靶标，难以深入。威胁金融安全的因素包括国内外两方面，但因更侧重于国外因素的分析。第二是以往的定义没有紧扣中国目前时代背景，没有强调金融安全内涵的国别性，不同国家金融安全内涵应与本国国情相适应。国内学者目前对金融安全内涵的界定更多考虑各个国家金融的共性，没有将金融安全置于我国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因此，顾海兵（2011）从经济安全的视角下界定金融安全内涵，将其作为经济安全的子系统之一，将安全界定于外部冲击下通过内部传导引发问题，着眼与直接外部冲击或简洁外部冲击对中国金融运行风险的传导及影响。认为中国金融安全内涵的理解和定位是：通过加强自身金融机制的建设，使我国金融体系具备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以保证我国的金融体系在面临外在因素冲击时能继续稳定运行、健康发展，进而有效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并以金融安全条件和金融安全能力为框架对金融安全展开研究，金融安全条件主要是指我国金融体系在开放过程中面临的外部冲击，如外资银行的进入，国际热钱的投机冲击等，而金融安全能力主要是指我国金融系统所具有的应对外源危险的能力，其中涉及我国金融市场化建设，如利率市场化建设，银行产权多元化等，因为这些转轨措施将直接影响我国内部金融传导机制的健康程度(金融安全能力的大小)。

孙建国（2018）科学总结归纳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防范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国经济安全与健康发展，全面展开了维护当代中国金融安全与防控金融风险的思考与实践探索，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金融风险防控思想体系。该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基础，以强化监管为核心，具有重要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强调金融安全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滑冬玲（2019）认为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金融稳定高度关注，逐步形成了新时代金融安全观。从背景、作用、对策三个角度总结新时代金融安全观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决胜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国家安全是人民利益的根本保障，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稳定对经济稳定起着重要作用、维护金融安全是保持经济安全的关键。保持金融安全涉及防范外部金融冲击、局部金融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中国金融安全需要从防、控两方面同时着手：防是指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准确判断风险隐患、通过金融制度建设和金融改革，避免金融风险出现，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控是指在全面掌握金融风险点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宏观调控政策、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应对金融风险，防止金融风险扩散，控制金融风险的损害和影响，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黄莺（2022）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的金融安全理论进入系统整合、加速构建的新阶段，与西方主导的金融稳定理论相比，中国的金融安全理论强调在发展中抵御内外风险、维护金融主权，具有鲜明的系统性、前瞻性和实践性。在百年变局下，中国金融安全面临新的时代挑战。提出金融安全设计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维护金融体系本身的稳定运行；二是以金融手段有效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促进经济安全，保障科技安全、生物安全、 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军事安全等；三是以金融手段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核心价值观；四是以金融手段维护海外利益和国家利益。

二、金融安全测度研究回顾

我国对金融安全的测度研究以建立综合指数为主，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结合时代背景构建了不同的指标体系用以衡量金融安全状况。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机构或学者先后提出了衡量国家金融风险或安全的度量评价体系，如美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研究所的富兰德指数，《国际各国投资指南》中的综合风险指数，欧洲货币国家风险等级表，日本公司债务研究所的国家风险等级表，美国CAMELS评价指标体系，IMF金融稳健性评价指标体系，而国内学者则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开始进行国家金融安全测度研究。

姜洪和焦津强（1999）最早研究了如何建立我国金融安全指标体系。他们首先研究了国际常用的6个衡量国家金融安全状况的指标，即：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偿债率（债务国当年偿债额占商品与劳务出口收汇额比重）、偿息率（债务国当年外债偿息额占商品与劳务收汇额比重）、债务率（债务国年末债务余额占当年商品与劳务出口收汇额比重）、负债率（债务国未偿还外债总额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作为金融安全状况预警指标的有效性。在对比了近年来发生金融危机与未发生金融危机的多个国家6项指标后，发现上述6项指标在预测国家是否会爆发金融危机方面不起作用。姜洪和焦津强（1999）认为对一国金融安全来说最重要的是外力的干预力度，故从外力干预的角度来看对金融安全安全影响最大的是最有可能被干预的外债归还可能。由此提出了国家金融安全指标体系的三个指标：（1）国际储备占外债总额比率；（2）当年还本付息额与国际储备比率；（3）短期外债与国际储备比率。通过分析后认为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结合国际经验数字分析，将100%作为安全线，80%作为警戒线，当国际储备/外债降低时应实行严厉审查，降低至40%时进入紧急状态。

蒋海（2009）结合中国实际，从微观、宏观、国际市场三大类17个金融经济指标，采用主观赋权法与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对中国1998-2007年金融安全指数进行估算。在指标选取方面，蒋海（2009）在指标选取方面与以往研究有一定区别，主要体现在：（1）选取指标均与金融安全正相关；（2）采用资本充足率、资产收益率、存贷比等反应金融机构经验状况指标取代以往的银行存款这一广泛使用的指标；（3）综合考察中国主要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经营状况与流动性，而不是集中于国有银行信贷领域；（4）对经常账户指标进行精简；（5）考虑到中国证券市场尚不成熟，未采用证券市场价格这一指标；（5）考虑到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和相对较少的外债，未考虑外债指标。

顾海兵（2011）在界定金融安全内涵的前提下，从金融安全条件和金融安全能力两方面出发，构建金融安全指标体系，并以此获得我国金融安全指数。顾海兵（2011）认为以往指标构建方法具有指标选取泛化的缺陷，容易将只属于金融风险或金融稳定的指标选入，因此以金融安全条件和安全能力两个子系统来选取指标。安全条件子系统用以衡量我国金融体系在开放过程中面临外部冲击的大小，安全能力子系统衡量我国金融系统所具有的应对外源危险的能力。此外还吸收了一些间接对金融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的指标。具体的，金融安全能力子系统可分为三部分：金融系统制度建设、金融系统物质基础、金融系统的受力。金融系统的物质基础即从微观层面考察我国的金融安全能力，主要是指我国金融系统所具有的资产质量，其优劣直接影响我国抵御外在恶性冲击能力的高低，是金融安全能力系统的基础。金融系统的受力是从宏观经济层面考察我国的金融安全能力，指本国宏观经济对金融系统的影响，包括动力与压力，经济形势良好必然会给金融发展提供动力，可以有效提升一国的金融安全能力，经济不景气或者经济过热则可能与金融系统的漏洞隐患相结合，大大削弱一国的金融安全能力。金融系统的制度建设主要是指目前我国金融系统所进行的市场化建设，以往国内学者研究未引入相关指标，导致无法体现中国处于转轨期的特殊国情。金融安全条件子系统用来衡量我国金融体系在开放过程中面临外部冲击的大小，文章考虑了当时我国金融开放的特点，着重选取了外资银行、国际热钱相关指标。

顾海兵（2012）同样从金融安全条件和金融安全能力的角度构建指标体系，由于金融安全条件偏重于外部冲击，将其界定为外部金融运行风险，最终将金融安全分为宏观经济运行风险、金融机构运行风险、外部金融运行风险3个子系统，在每个子系统下选取了一定数量指标。在指标权重方面，采用了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子系统权重和指标权重。继而对于金融安全指标划分了警戒上下限，在划分时综合采用了3种方法：（1）对有国际公认标准和惯例的指标，采用国际通行标准作为指标警戒上下限；（2）结合相关领域专家文献和经验数据，参照金融背景相似国家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指标临界值确定警戒上下限；（3）对于难确定警戒限的指标，根据最近5-10年的指标观测值的平均值上下浮动若干百分点作为警戒上下限。

何德旭（2012）从宏观经济安全、中观经济安全、微观金融市场机构和国际外部风险冲击四个方面选择22个基础指标，构建了中国金融安全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和主观赋值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各基础指标权重，并对1985-2011年中国金融安全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具体指标选取方面，他在中观层面考虑了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的风险，加入了相关指标。

张安军（2014）同样沿用了金融安全条件和金融安全能力两大维度的框架用以构建国家金融安全监测指标体系。在指标选取方面，综合运用了专家统计法和社会调查法，并对入选的指标根据2008金融危机后经济和金融的变化进行调整，选取了20个指标。在指标权重方面，结合主观与客观赋权法，采用熵值法权重对AHP法权重进行修正调整，作为最终权重。最后对我国1992-2012年金融安全监测得分进行动态比较分析。

贾晓俊和李孟刚（2015）从经济环境和金融行业运行两方面构建金融安全指标体系并合成金融安全指数来综合评价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经济环境包括国内环境指标及国外环境指标，金融行业运行包括运行状况指标和稳健性评价指标。在指数合成方面，该文选择主成分法合成综合指数。创新点主要体现为，将已有的研究中未考虑的因素如表外业务、同业业务和影子银行等纳入到新建立的金融安全指标体系中，从而使研究结果更符合实际。此外，以往研究中均使用年度数据，而该文采用月度数据提升了监测的频率，使研究结论更加准确。

郭娜（2018）考虑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动力发生变化，区域性金融风险成为了我国面临的巨大考验，因此有必要建立我国区域金融安全识别体系。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上，由于研究的重点是区域金融安全，因此在指标选取上更加突出了区域经济因素，选取了区域金融业指标、区域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区域宏观经济增长指标、区域工业发展指标、区域消费指标、区域外部环境指标6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31个省份使用因子分析法计算了金融安全指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马尔可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MS-VAR）模型衡量区域金融安全指数状态。

杨淼（2019）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要求金融安全概念要根据形式变化调整充实，测度金融安全状况的指标体系即使修正完善，是金融安全理论研究得以不断发展深化。但现有文献中金融安全概念内涵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可从金融风险特征角度对金融安全概念外延进行界定。基于“空间维度—风险防范—细分指标”步骤筛选指标构建中国宏观金融安全指数指标体系，空间维度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其中，宏观维度指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主要包括 GDP、CPI、PPI、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登记失业率、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工业产能利用率、房地产价格、房地产开发投资等指标。中观维度指金融市场情况，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市场风险， 汇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外汇风险，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风险，财政运行过程中的财政收支和债务风险、货币发行和供应风险，股票市场风险等领域。微观维度指金融机构情况， 主要包括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面临的信用风险、经营风险和流性风险等内容， 包括不良贷款、存贷比、资本充足率、外汇贷款占比、房地产贷款占比等指标。并进一步从宏观经济运行、货币发行和供应、商业银行、利率、财政收支、债务、外汇、股市、国际投资、国际贸易 10 个方面筛选主要指标。最终构建了10个一级指标，66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在指数计算方面，采用变异系数法进行赋权并对数据提前进行季节调整。最后对我国宏观金融安全的10个方面及总指数进行了实证分析。

张金清（2021）仔细考察近年来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突发事件后，发现流动性匮乏是金融风险事件的导火索。考虑到我国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的完备，张金清（2021）认为影响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已经从外部冲击转变为内部问题。因此，提出从流动性角度定义金融安全，提出金融安全是金融体系中的各部门拥有足够的流动性资产偿还流动性负债，从而建立稳定而持续的部门间金融信用关系，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态势。在金融安全测度方面基于部门流动性资产负债表进行金融安全评估，之后借鉴Merton-KMV模型构建金融安全指标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历史情况进行系统评估。

三、金融安全预警研究回顾

Frankel和Rose(1996) 利用1971～1992年发生在105个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为分析对象，并通过季度数据建立了FR概率模型以度量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研究得出当经济增长率越低、国内信贷增长率越高、国外市场利率越高、外商直接投资/外债越低、实际汇率被高估时，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越大。Sachs等( 1996) 以月度数据作为样本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最终得出结果认为，实际汇率贬值越高、国内私人贷款增长率越高、国际储备 /M2越小说明金融危机越有可能发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后，IMF专家Morris Goldstein（1998）提出7项经济预警指标。Reinhart等（1998）总结了1998年之前与货币危机研究文献中相关的103个预警指标，分为六大类：外部变量、金融变量、结构变量、公共财政、实际变量和政治变量，分析和归纳了这些变量在以往研究中出现的次数以及检验是否显著的情况，最终提取了16个预警指标建立信号分析法（KLR）模型。Krkoska（2001）使用带有约束的VAR模型对金融安全进行评价。

何建雄（2001）认为我国经济金融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差、激励机制不健全、市场纪律约束不力监管力量薄弱等问题；二是，在WTO框架下对外开放步伐将加快体系性风险可能增加。因此提出完善的金融稳定自我评估系统至少由3个层次的审慎指标组成，即机构层次的微观审慎指标的综合、宏观审慎指标和市场指标。进一步在三层指标下选取了15项具体指标作为预警指标。此外，何建雄（2001）认为金融安全预警体系仅有指标远远不够，还需要有配套的法规框架、组织框架、报告制度、预警系统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监督机制和其他配套措施。

林伯强（2002）从偿债的角度考虑了国家金融安全问题，提出了一个用于预警一国外债风险的动态模型，即多元累计和模型，模型的用户（债权人和债务国）能很早预测可能导致债务国重订债务期限的金融危机。使用外债/储备、偿债率、通货膨胀率、进口/储备和投资/GDP作为变量，运用多元累计和模型（MCS）模型评估1985-2000年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的总体状况，发现中国金融状况早在1992年底出现问题，体现了MCS模型的提前预警能力。

董小君(2004) 根据金融危机预警的对象，在引发金融危机相应变量的基础之上，提出构建以宏观经济平衡指标为基础，金融机构稳健指标为核心，金融市场指标为中介的三个层次33个监测指标组成的中国金融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马一民（2004）认为我国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应包括五个方面：（1）金融安全监测预警方法，包括先行指标法和信号显示法两类。（2）金融安全监测预警模型。（3）金融安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包括三大类分别为货币危机监测预警指标、银行危机监测预警指标、股市危机监测预警指标。（4）金融安全监测预警传导机制。（5）金融安全监测预警信息系统，系统应具有数据处理模块、临界值管理模块、预警信号系统模块和对策备选模块。

沈悦和张珍（2007）针对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特点，从分析金融危机类型入手，设计基于全面开放条件下满足中国金融业健康运行的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从国际环境、货币安全、银行安全、对外安全、股市与房地产安全五个方面共选取了22个监测指标。在建立预警指标体系后进一步需要确定数据的安全区间，沈悦和张珍（2007）基于以往研究和国际公认的界限确定了每个指标较大风险、风险、基本安全、安全的区间。之后采用AHP-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总体指数并从0-100分划定预警指数的安全等级。

张安军（2015）从先导性和免疫性两大维度构建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家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先导性指先于国家金融安全形势恶化之前发出预警信号，免疫性指抵御国家外援金融风险能力出发来考虑。通过选取KLR信号分析法，从先导性、免疫性、与总体警情3个方面对我国1992-2011年金融安全的警情进行了动态定量测算分析，研究得出: 1992～2011年我国金融安全程度处于从重警、中警到轻警、无警逐渐上升的过程; 依据我国金融安全警度值可将我国金融安全警情划分为有警时期(1992～2003年)与无警时期(2004～2011年)两个明显时期，其中有警时期包括重警度时期(1993年)、中警度时期( 1992年、1994～1996 年、1998～2001年)、轻警度时期( 1997年、2002～2003年); 2001～2011年我国金融体制建设保障能力不断增强，银行机构风险快速下降，对外债务风险持续改善，宏观经济风险得到合理控制，这些是促使国家金融安全程度提升的关键因素。并构建了涵盖开放条件下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内部与外部各种因素的预警系统。

肖斌卿（2015a）根据我国在开放条件下所面临的金融安全形势，构建了涵盖开放条件下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内部与外部各种因素的预警系统，并利用神经网络对金融安全预警系统进行建模，以1996~2014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对模型进行仿真和验证，并运用所构建的预警系统对2015年中国金融安全状态进行了综合判断。结果预估2015年我国金融系统基本安全，短期经济失速的可能性较小，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型和优化将为未来经济和金融发展注入更多内生增长动力，但同时需要重点防范由信贷资本投资额削减及地方债务问题所带来的潜在金融风险。

肖斌卿（2015b）在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中补充影子银行相关指标，保证高杠杆、高流动性风险经济参数参与建模，使得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更加完整；运用因子分析计算7个金融子系统及整体金融系统安全得分，使用基于遗传算法优化的人工神经网络（GA-ANN）建立中国金融安全预警系统，观察金融系统运行是否平稳、金融安全得分是否出现剧烈波动或异常值，并对2013年我国金融安全状况进行预测。结果显示2013年下半年我国金融系统总体运行安全，但在影子银行、股市和保险子系统存在一定不安全因素。

四、金融安全影响因素研究回顾

对于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因素，或是各类因素和变化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同样起始于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刘劲松（1998）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国际金融评级机构的作用，以及对金融危机和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他认为第一，经济全球化发展极大提升了评级机构的地位；第二，金融评级机构对金融危机的深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三，金融评级机构遭到强烈抨击，运作方式和标准受到广泛质疑；第四，金融评级机构一些工作的客观性不应否认，独特作用不容忽视。第五，中国日益感受到来自金融评级机构的压力。因此，对待国际评级机构既要尊重其专业地位又要绝不迷信盲从。直接参与评级机构的运作过程，建设本国具有国际水平的评级机构也是一条趋利避害的捷径。

刘大富（2000）认为威胁我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国有企业；（2）国家内债；（3）国家外债；（4）国内金融秩序；（5）外部冲击。在国家债务方面认为我国的综合债务可以分为3部分，即政府发行国债、外债和我国国有经济所形成的坏债其中主要是银行的坏债。因此构建了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水平指数=（国家内债余额+银行坏债+全部外债）/名义GDP和修正的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水平指数=国家内债余额+银行坏债+全部外债）/名义GDP+通货膨胀率。

汪祖杰（2001）认为影响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内因包括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不完备性；外因产生于金融资本的两个基本特征：万能垄断者和金融资本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这些关系是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正常的国际资本流动可以改善金融资源的配置状况而非正常的霸权性国际资本流动只会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而危机金融安全。采取多极化的反国际金融霸权的战略与策略是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条件之一。

钱小安（2001）研究了金融开放对金融安全的影响，认为第一，金融开放式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是一种历史趋势也是一种发展动力。第二，金融开放会加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金融体系更容易受到冲击，金融危机具有累积性、突发性和传递性三大特点。我国的金融安全面临主要问题为：风险隐患较为严重微观经济基础薄弱金融机构内控不力金融资产质量较差金融机构资能抵债的能力较低。而国际游资可以为金融危机储存巨大能量尤其是大量游资流入会加剧国内金融资产泡沫一旦游资发生大幅回流就会出现价格暴跌。因此大量国际游资会成为发生金融安全问题的“定时炸弹”。

陈金贤（2001）对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5个因素进行了分析，即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与三位一体的国有经济体制，国家隐性内债规模，国家变相外债，国内金融秩序的无序性，国际金融流动的冲击。分析了我国的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水平，指出决定我国综合金融风险水平的是我国的国家综合负债水平，现阶段我国国家综合金融风险水平还处于较低的程度。因此，对我国不良资产的处理是必要的。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于资产管理公司在我国现在的市场条件下的作用，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和模式的判断，我国金融市场的证券化程度，关于不良资产的转让问题及债转股问题。提出警示，谨防债转股导致另一种亏损国有企业的出现；谨防债转股导致出现银行风险逆向上升。

张亦春（2002）运用新兴古典的分析范式，对金融全球化、金融安全和金融演进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研究了金融安全和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提出首先金融安全是相对金融风险而言的；其次，实现金融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促进金融创新的不断演进。认为金融全球化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它是由分工演进和经济发展本身的逻辑所决定的也是由金融本身的特点和演进逻辑决定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顺应金融全球化潮流、推进金融对外开放进程与保卫本国金融安全、维护本国金融利益始终是一对相伴相生的矛盾;要在一个全球化日甚的金融宏观背景下维护本国金融安全关键在于实现金融创新的不断展开而金融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方面内容;文章最后探讨了维护我国直接、间接金融安全的可行途径。

唐庆国（2002）研究了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证券开放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提出证券市场开放冲击金融安全的途径和传递方式：第一，资本账户开放强化国际金融市场对国内的传导和影响；第二，关联度提高的证券市场易受外因影响；第三，国内证券行业生存竞争进一步加剧；第四，市场缺陷、相对落后的金融调控手段极易引发金融波动；第五，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比较薄弱，难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此外，唐庆国（2002）认为我国证券市场公信力缺失是危及金融安全的根源，建议有序推进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切实把握开放程度与次序；加快市场结构创新的步伐；引进QFII、组建中外合作基金参与投资国内A股市场；改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市场运行与管理机制。

郭连成（2005）以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具有典型性意义的经济转轨大国为主要考察对象，对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展开深入研究。从外部因素看，经济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是转轨国家金融安全问题产生的重要外在条件。第一，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经济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而转轨国家忙于制度变迁而准备不足。第二，金融金融全球化推动了金融资本的国际化进程和国际资本的大循环使得世界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金融业务量猛增世界金融市场的竞争也因此而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对世界金融市场的有效调控在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特殊阶段的转轨国家金融体系容易受到冲击。第三，金融全球化迫使那些实行金融市场保护的转轨国家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其结果一方面促进了资本向世界市场特别是向转轨国家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也使世界金融体系得以扩大。第四，在金融

全球化条件下许多转轨国家经济过分依赖于外国短期投机资本这种依赖性导致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过于脆弱。尤其是当国际游资进入转轨国家扰乱金融市场时就会形成巨大的风险这已为俄罗斯和中东欧一些转轨国家的教训所证实。第五金融全球化不仅给世界金融体系增添了不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而且也使转轨国家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更具风险性。

李成（2006）基于IS-LM-BP模型阐述了资本流动-经济非均衡的生产机制，揭示了资本流入规模、资本流入结构、外汇储备及经常项目是影响一国资本流动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通过建立资本流动影响金融安全的测算体系，对1996-2005年我国资本流动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资本流动状况总体较好，状态界定为安全；（2）资本流入规模正常但期限结构不够合理；（3）现阶段我国资本流动的安全运行有保障。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课题组从能源角度研究了全球能源格局下我国能源金融安全。当今能源已经金融化，能源期货价格已成为国际能源市场定价的依据，成为国际价格形成机制的核心。而欧美垄断全球主要能源交易市场，金融机构已成为市场交易的主导力量，投机导致现货价格巨幅波动。我国在全球能源消费市场中的存在几个特点，一是消费量大，二是对外依存度高，三是进口议价能力弱，四是地缘政治风险大威胁能源安全。而我国参与国际能源金融市场有限，表现在我国能源金融期货市场薄弱，境内企业在境外套期保值需求庞大，能源金融交易多头监管情况严重。对我国来说能源金融化带来了以下挑战：（1）能源价格对成本推动有辐射作用；（2）在全球金融财富分配中处于被动地位；（3）对国内金融系统稳定构成威胁。因此我国应在国家层面做好统筹规划与战略布局。

张承惠（2015）研究了新常态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带来的新挑战。由于实体经济在新常态下产生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金融体系也将产生长久深刻的影响。认为金融服务新要求的核心是提高中国金融服务的效率和金融体系管理风险的能力。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总体偏低，远未实现金融价值创造的最大化，也不能适应“新常态”带来的新要求，必须加快推进金融业的转型升级。

张红力（2015）研究了金融安全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认为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利益，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共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是保障金融安全的根本要义。国家利益博弈的结果取决于金融安全战略的高下，而制定国家金融安全战略，迫切需要解放思想、正本清源，正确看待三个问题：首先，金融安全不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也不是被动防御的过程，不能仅用指标来进行衡量，从技术角度维护金融安全往往是危险的，让技术指标符合“国际警戒线”的努力反而会让一国陷入战略上的被动，需要从整体的、长期的、全盘的、深远的、主动的战略角度来进行考虑、设计和实施；其次，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谋，不是阴谋；最后，安分守己并不安全，“对外乱中有为，对内底线思维”共同构成了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核心战略思想。

罗素梅（2017）以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视角考虑了外汇储备优化管理的问题。首先，根据外汇储备需求理论，将外汇储备划分为金融安全储备和国家利益储备。其次，尝试性地引入安全第一准则，构建基于金融安全的外汇储备优化配置模型。再次，通过对理论模型求解和数值模拟，测算出外汇储备的金融安全规模和国家利益规模，并对其进行优化配置． 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可将65%左右外汇储备用于满足金融安全，而其余35%左右可用于实现国家利益。

马理（2018）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安全的影响，认为跨境资本流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我国的金融安全：（1）过度的汇率波动影响金融安全，汇率过分波动可从宏微观两方面危害金融完全；（2）不恰当的资本账户开放将影响金融安全，过度开放资本账户会威胁国内金融稳定，现阶段应保持一定资本管制；（3）洗钱和资本非法外逃影响金融安全，洗钱和资本外逃严重威胁银行稳定，对国际收支和国家税收都有严重危害。

严海波（2018）研究了金融开放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以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及后续为研究点，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新情况。新情况有以下几点：一，对有关金融开放经济思潮的反思；二，发展中国家对金融开放的适应性减弱；三，全球金融周期变化导致发展中国家金融风险增大；四，部分发展中国家努力“去美元化”；五，世界对金融开放的推进“有收有放”。提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应该坚持几项原则：（1）坚持金融开放式保护主义；（2）坚持平等开放、对等开放原则；（3）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只能定位；（4）建立主权信用创造的货币发行机制（5）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6）谨慎对待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

张发林（2018）从金融安全的角度研究了国际货币制度变迁中“均衡困境”。在梳理国际货币制度和变迁历史的基础上，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制度变迁已经陷入了“均衡困境”。提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对金融安全造成以下影响，首先，由于美元霸权，美国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存在长期宏观经济失调。其次，国际收支调节不力，缺乏国际收支调节手段。第三，汇率制度多样化导致汇率大幅波动和汇率失调。第四，国际货币组织低效。

吴婷婷（2020）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路径。基于第四代金融危机理论、金融脆弱理论和经济与金融关系理论提出贸易摩擦对中国金融安全影响的作用路径，采用偏最小二乘路径分析法，分别构建简单路径模型和复合路径模型。结果显示，研究期复合路径模型更合理，贸易摩擦直接负面影响对中国的金融安全影响效果是显著的，并且贸易摩擦直接负面影响可通过对市场情绪产生积极引导，进而正向影响中国金融安全；而贸易摩擦直接负面影响指标通过中国经济基本面的途径影响中国金融安全的结果则不显著。

卓丽洪（2020）研究了互联网金融与经济安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联度。收集整理了2014年1月～2019年9月网络借贷、货币、证券、期货、生产制造、消费、物流、能源、银行、国家财政、彩票、税收、融资等国民经济关键领域共３４个指标的月度时间序列，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与关键的经济安全构成要素之间普遍存在较强的关联。

杨荣海（2020）从“三元悖论”视角对人民币加入SDR后的金融安全进行了分析。文章在“三元悖论”基础上，构建人民币参照美元、欧元和日元的ARDL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和资本账户开放在人民币加入SDR前后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以讨论“悖论”之间应当如何权衡来避免给中国金融安全带来影响。文章得到的结论是：首先，货币政策独立性对金融安全有一定程度显著的正向影响，加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可以提升金融安全；其次，汇率稳定性对金融安全没有显著影响；再次，实际资本账户开放，以及2016年10月加入SDR以来的实际资本账户开放可以明显提升金融安全。最后，2016年 10月人民币加入 SDR对中国金融安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章认为相关部门应当不断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将重点放在保持稳健货币政策和开放资本自由流动兼顾方面，这样才有利于中国的金融安全。

马理（2021）研究了非法洗钱和资本外逃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文章基于中国 2004～2018年的宏观数据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VECM) ，实证分析了非法洗钱与资本外逃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非法洗钱不但会对中国的金融安全造成直接的负面冲击， 而且会通过资本外逃渠道对金融安全产生间接的不利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相关问题研究”课题组（2021）从马克思主义视域研究了当前我国金融安全的现实性。提出金融安全与国土安全的表现形式与表现特征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主权核心利益。面对西方国家的在国土安全上的一些手段，我国不能在金融安全上放松警惕。

五、金融风险测度研究回顾

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概念上较为相关，对于金融风险的测度研究与金融安全测度研究相比较为丰富，近年来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研究较多。

王国实（2000）考虑了我国金融风险统计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设计，研究了设计原则和体系框架，将指标分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统计监测预警指标和非系统性金融风险统计监测预警指标两类。宋海林（2001）建立了一条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由指标体系、预警界限、数据处理和灯号显示四部分组成。指标体系由宏观环境稳定性、银行内部稳定性、泡沫型风险、国债风险、外资冲击型风险5个子系统构成。

何旭彪（2008）总结了金融风险综合评估方法的最新研究进展，从金融风险综合评估方法所需解决的基本问题入手, 详细阐述了金融风险计量方法中的主流模型及其研究现状, 结合 Copula 理论介绍了风险综合评估方法的最新进展, 并根据综合评估方法中存在的问题讨论了综合评估方法的前景及展望。

宫晓琳（2012）利用未定权益分析方法(CCA)，在汇集、处理与整合编制多方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国民经济机构部门层面的风险财务报表，测度了2000—2008年我国的宏观金融风险，并直观展示和分析了该期间国民经济各机构部门风险敞口的动态演变情况。

杨子晖（2019）采用预期损失指标（ES）来衡量中国金融市场及各金融部门的极端风险并结合回溯测试方法进行后验分析，发现ES指标能够对极端风险进行有效测度。宫晓莉（2020）计算了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测度指标条件风险价值和边际期望损失，以研究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效应以及时变特征。

白鹤祥（2020）从房地产市场的角度研究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与预警，在风险指标的构建上，使用金融机构的违约损失、传染损失和与金融机构权益总额之比来度量房地产市场引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并进一步定义了脆弱性指标和传染性指标。

杨子晖（2018）采用VaR、MES、CoVaR、和ΔcoVaR四种风险测度方法对我国 A 股 56 家上市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公司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展开研究。杨子晖（2021）从非线性的研究视角，对国际主流金融风险测度方法的预测能力以及在中国的适用性展开全面、综合的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降维方法构建出更具“前瞻性”的“风险测度指标”，并结合GSADF方法考察降维指标的风险识别能力与预警能力。

陈湘鹏（2019）对微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以“能否涵盖规模、高杠杆率和互联紧密性三方面信息”、“排序结果是否与银保监会认定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相吻合”、“是否具有宏观经济活动预测力”三方面对上述指标在我国金融体系的适用性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SRISK更适于作为我国微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

何青（2018）从实体经济的视角研究了中国系统性风险的度量问题，综合考虑机构个体风险、联动和传染效应、波动和不稳定性以及流动性与信用等风险因素， 采用主成分分析分位数回归法( PCQＲ) 构造出可以全面反映实体经济运行情况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 并对系统性风险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途径进行了探究。

李敏波（2021）研究了中国金融市场压力指数的构建和状态识别。本文根据中国金融市场特点，选取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17个有代表性的指标，运用经验累积分布函数法分别构造了各子市场的压力指数，以各子市场之间时变的相关关系刻画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特征，合成金融市场压力指数，并通过建立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对金融市场压力状态进行识别。

王辉（2020）通过构建偏态t-分布动态因子Copula模型，利用时变荷载因子刻画单家银行与整个系统的相关性，计算联合风险概率作为系统性风险整体水平的度量，基于关联性视角提出了新的单家机构系统脆弱性和系统重要性度量指标———系统脆弱性程度和系统重要性程度。该方法充分考虑了银行个体差异性和系统的内在关联性以及收益率的厚尾性和非对称性，从而能够捕捉到更多的信息且兼具时效性。

国外对金融风险测度的研究同样较多，从整体水平的度量角度，金融压力指数是一种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风险的指数。加拿大央行的Illing&Liu（2006）选取加拿大银行部门、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具有代表性的11个指标作为变量，运用加权方法将这些变量合成单一指标，编制了加拿大的金融压力指数，并利用加拿大历史压力事件进行了回溯检验，发现金融压力指数能够识别样本域内的压力事件，效果较好。之后美联储(Nelson and Perli, 200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Lall et al., 2008)、欧央行( ECB, 2009)和中国香港金管局( Yiu et al., 2010)等境外主要中央银行和国际组织纷纷利用金融市场数据编制了金融市场压力指数。Balakrishnan et al.（2011）研究构建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压力指数，并探讨了发达国家的金融压力向新兴市场国家传导问题。Brownlees（2017）提出了系统性风险指数SRISK。

风险传染测度法也是测度和识别金融风险的一种方法，侧重于多角度测量金融机构间的风险溢出和传导效应。Muller（2006）基于银行间交易数据建立与资产负债表相关的风险敞口网络模型，Billio（2012）及Acharya（2016）则从金融机构收益率的相关性出发测度风险传染的可能性。

在单个指标方面VaR(Value-at-Risk)已经成为一种标准金融风险计量工具，巴塞尔协议中规定，成员银行和金融机构可采用VaR风险计量技术建立内部风险模型。此后，Rockafellar（2000）进一步提出条件VaR(CVaR)指标，与VaR相比CvaR具有一致性。相关学者提出了“期望损失”ES这一指标满足一致性要求，巴塞尔协议三正式提出使用ES指标逐步代替VaR作为市场风险的主要衡量标准。Adrian（2016）提出条件在险值差ΔcoVaR，用来进行系统重要性的识别和度量。

Copula函数由于经常被用于构建联合分布，进行风险传染建模，并且具有非线性相依结构的捕捉能力，因此常被用于度量不同机构之间风险的溢出传染效应。Patton（2006）引入了条件Copula概念，建立时变Copula函数，用于研究汇率不对称的相关结构问题。Oh和Patton（2018）进一步提出偏态t分布动态因子模型刻画银行系统的整体相依结构，通过因子结构降低了维度，并通过设置因子分布满足金融数据的特性。

六、文献述评

我国金融安全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研究始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内学者开始重视我国金融安全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处于较为初始的阶段，主要集中于对金融安全概念内涵的界定和以金融危机爆发国家为例对于我国金融安全的指标进行研究。由于1997年金融危机多表现为外债、外汇问题，这一时期的金融安全测度指标研究中将国外债务相关指标作为衡量一国金融安全的主要指标。而在其他金融安全的研究上，这一时期的研究从对金融危机爆发过程的观察中总结并研究了国际评级机构对国家金融安全的影响。

进入2000年，2000年初金融安全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我国经济处于转轨中，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不佳，国内金融机构存在大量坏账问题，同时我国股票市场也存在严重不规范的情况，“庄家”操控股票收割散户，投机风气严重。因此，这一阶段我国国内的金融风险较为突出，如何衡量国内的金融安全状况，成为了这一时期我国金融安全相关研究的侧重点。二是由于我国加入WTO在即，加入WTO使得我国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扩大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这不仅会导致我国对外风险暴露变大，外资进入我国资本市场，使得我国更加容易遭受国外的金融冲击；并且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如银行和投资机构等水平较低，相关监管也尚不完善，在与高水平国际金融的竞争中容易处于不利地位，同样威胁着我国金融安全。这一时期的金融安全研究较多考虑了我国金融开放对金融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在预警指标的设计上也综合考虑了国内与国外两方面的指标。

此后，在金融安全的概念内涵方面，不同学者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顾海兵（2011）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研究进行了较好的总结与归纳，并提出从金融安全条件和金融安全能力两个方面展开对金融安全的研究。这一观点在许多之后的研究中得到沿用，在构建金融安全指标体系中有着较多应用。在之后几年中，几乎没有学者再提出金融安全概念的新研究，直到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金融行业发展陆续发表重要论述，特别是将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防控提高到国家战略的位置，彰显金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使得许多学者重新关注并研究了新时代中国金融安全理论。

新时代金融安全理论和金融安全观是建立在我国新时期的国情和国际环境之上的。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资本市场，股票、期货、期权等各项金融市场的运行得到了较好的规范；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成功拜托了以往的坏债问题，经营状况良好；在对外方面，常年外贸顺差使我国积累了巨额外汇，相比而言我国的外债数额较少，对金融安全威胁较低。我国金融安全能力在十几年间得到了大幅增长，而国际金融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期间最大的事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后续各国为重振经济而采取的措施导致国际货币和金融环境产生了重要变动。而十几年间，互联网的发展也对金融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变化共同使得世界金融市场不断扩大，金融衍生品不断增加，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不断增长，对我国而言，在新时代金融已经成为经济的核心之一，金融安全也成为了国家安全的核心。而近期全球经济增速下降，美联储大幅加息对世界金融安全提出了新考验。

新时代金融安全的内涵与以往相比在一些方面有了更加具体、明确的定义，这也为金融安全测度、金融安全预警指标的选取提供了更直接的指引。首先，提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防控系统金融风险的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风险防范的基本手段。其次，提出防范外部冲击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基石，一方面加强和亚洲等国家区域内金融合作和货币流动，另一方面推动给金融机构和市场双向开放，倒逼我国金融市场水平提升。再次，提出金融体系内生风险积累和传导是金融风险防控的重心。最后，统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系统金融风险防控的有效途径。

在金融安全的测度和预警方面，研究者们多采取构建指标体系，计算综合指数的方法对我国金融安全状况进行测度，或构建预警指数后再设立预警界限对金融安全状况进行预警，取代了之前用个别指标反应金融安全的方法。多数研究者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选取能够反应我国金融安全的指标，涵盖了国内和国外两方面。在指标权重选取方法上多使用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如AHP法和熵权法。在具体指标的选取上则由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各有区别。

在金融安全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近年来研究考虑了“新常态”、跨境资本流动、互联网金融、资本外逃、中美贸易战等新因素对金融安全的影响，在金融开放等方面随着中国金融实力的增强，与以往相比研究内容和结论都有了很大变化。

金融安全的相关研究，存在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以国内研究为主，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罕有对金融安全的研究，而是以金融稳定、金融风险的研究为主。这一特点可以从金融安全这一概念自身的内涵中找到解释，不同对金融安全内涵的理解中都包含抵御国外金融攻击这一内容。由于国际金融市场以欧美金融机构为主导，交易规则也由欧美制定，使得一般而言没有国家能够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对欧美尤其是美国发起金融攻击，恰恰相反以往东南亚和南美国家的金融危机中往往有欧美金融机构的参与。由于外部威胁缺失，欧美国家仅需保证国内金融市场不出现金融危机就可以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因此欧美学者缺乏对金融安全这一概念的研究，而更加注重金融稳定这一概念。对于金融市场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如我国而言金融安全则更加重要。

以往我国金融安全的测度和预警研究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指标体系构建流程，以及预警区间设置方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指标的选取方面，当前新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状况使得金融安全的具有了新的内涵，但在当前的金融安全测度研究中未能在指标选取上体现这些内涵的变化。例如新时代金融安全思想提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风险防范的基本手段，防范金融风险属于金融安全能力的范畴，以往研究在考虑金融安全能力时往往从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出发，选取GDP等指标，而忽略了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选取指标。而在反应国际层面金融安全时仍使用外债、外汇相关指标，没有将人民币国际化、区域货币互换等因素考虑进指标体系中。在反应国内金融安全的指标中也没有考虑互联网金融等新因素的影响。

其次，在指标数据方面仍以传统经济金融数据为主。多数测度研究仍以年为单位，少数研究将频率提高至月度。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而金融市场在经济中反应最快，金融危机具有瞬间爆发的特征，因此构建高频指标是对我国金融安全进行监测和预警的迫切需求。此外，大数据时代极大丰富了数据的类型和数据量，各种非结构化数据处理方法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工具，但以往研究没有充分利用非结构化数据的信息，也造成了指标选取上和数据获取上的局限。

第三，在金融安全预警研究上缺乏时效性。以往研究多采用构建预警指标体系，对各项具体指标及总体指数设计警戒区间的方式判断国家金融安全状况，并通过当前所处的金融安全区间对未来进行预警。这一研究方式首先，缺乏对未来的预测，仅能从过去金融安全状况的变化趋势和当前状况人为推断未来金融安全状态，与金融安全测度研究的差别主要在设立预警区间上，预警中提前预知的特点没有得到体现。其次，在指标的选取上同样没有体现预警的特点，所选取的变量依据金融安全的内涵而确定，没有考虑指标是否能够提前反应金融安全的变化。第三，使用数据缺乏时效性。部分金融安全预警研究虽然进行了预测，但使用数据仅为季度数据，大部分预警研究仍使用年度数据。这类低频的预测在当前情况下已经无法满足我国金融安全预警的需要。

第四，在金融安全测度和预警研究中，缺少对风险传染的考虑。金融风险是金融安全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安全的底线。而金融风险在国际金融市场或国内各市场之间均存在相互影响和传染的现象。在确定指标权重是是否应考虑各指标的传染能力，赋予传染影响大的指标更大的权重，而在预警指标中，是否应该依据风险传播顺序，选取预警指标。以往金融风险相关研究已经对风险的传播和影响进行了许多探索，而在金融安全研究中尚无这方面的考虑。

参考文献：

[1]王元龙.我国对外开放中的金融安全问题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1998(05):33-39.

[2]张幼文.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性质与研究要点[J].世界经济研究,1999(03):6-10+14.

[3]刘沛,卢文刚.金融安全的概念及金融安全网的建立[J].国际金融研究,2001(11):50-56.

[4]符莉.现实金融安全问题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2(09):26-28.

[5]王元龙.关于金融安全的若干理论问题[J].国际金融研究,2004(05):11-18.

[6]吴婷婷.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理论与实证[D].西南财经大学,2011.

[7]顾海兵,夏梦.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金融安全指标的选取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05):52-56.

[8]孙建国,高岩.习近平新时代金融安全与系统风险防范思想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8(07):15-21.

[9]滑冬玲.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其防范——基于新时代金融安全观分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06):28-36.

[10]黄莺.中国的金融安全：理论构建、时代挑战和应对思考[J].国家安全研究,2022(05):100-116+163.

[11]姜洪,焦津强.国家金融安全指标体系研究[J].世界经济,1999(07):9-16.

[12]蒋海,苏立维.中国金融安全指数的估算与实证分析:1998-2007[J].当代财经,2009(10):47-53.

[13]顾海兵,张安军,李彬.中国金融安全指数动态监测比较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3):11-17.

[14]何德旭,娄峰.中国金融安全指数的构建及实证分析[J].金融评论,2012,4(05):1-14+122.

[15]张安军.国家金融安全动态监测分析(1992-2012年)[J].国际金融研究,2014(09):89-96.

[16]贾晓俊,李孟刚.中国金融安全指数合成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15(01):55-65.

[17]郭娜,葛传凯,祁帆.我国区域金融安全指数构建及状态识别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8(08):37-48.

[18]杨淼,雷家骕.基于风险防范的中国宏观金融安全指数测度与分析[J].经济纵横,2019(08):89-107+2.

[19]张金清,张剑宇,聂雨晴,孙大钊.中国金融安全评估：2000～2019年——基于部门流动性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框架[J].管理世界,2021,37(06):70-86+4+88-108.

[20]Morries Glodstein. Presumptive Indicators /Early warly warning signals for vulnerability to financial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cs[R]. IMF Working paper, 1998.

[21]Frankel J, A Rose. Currency Crashes in Emerging Markets: An Empirical Treatment[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6(41).

[22]Sachs J, A Tornell, A Velasco. Financial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 The lesson from 1995[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6(1).

[23]Reinhart C, Kaminsky G.Financial Crises i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Different: Then and Now[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2):444-449.

[24]Krkoska L.Assessing Macroeconomic Vulnerability in Central Europe. Post Communist Economies[J].2001(13): 41-45.

[25]何建雄.建立金融安全预警系统:指标框架与运作机制[J].金融研究,2001(01):105-117.

[26]林伯强.外债风险预警模型及中国金融安全状况评估[J].经济研究,2002(07):14-23+89.

[27]董小君.美国金融预警制度及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4(4):38-43.

[28]马一民.构建我国金融安全网的思考[J].浙江社会科学,2004(06):53-55. [22]沈悦,张珍.中国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设置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10):89-94.

[29]张安军.国家金融安全动态预警比较分析(1992～2011年)[J].世界经济研究,2015(04):3-12+127.

[30]肖斌卿,颜建晔,杨旸,张璞.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建模与实证研究:基于中国数据的检验[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5(06):97-106.

[31]肖斌卿,杨旸,李心丹,颜建晔.基于GA-ANN的中国金融安全预警系统设计及实证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5,35(08):1928-1937.

[32]刘劲松.国际金融评级机构对金融危机和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1998(12):32-35.

[33]刘大富,陈金贤.对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的思考[J].国际金融研究,2000(05):66-69.

[34]汪祖杰.国际经济一体化中的金融安全分析[J].金融研究,2001(05):91-97.

[35]钱小安.金融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问题[J].管理世界,2001(06):91-95.

[36]陈金贤,刘大富,陈琳.中国金融安全的战略分析——兼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J].管理科学学报,2001(05):30-38.

[37]张亦春,许文彬.金融全球化、金融安全与金融演进——一个基于新兴古典范式的理论分析[J].管理世界,2002(08):4-10+23-154.

[38]唐庆国.金融安全、公信力和中国证券市场[J].管理世界,2002(12):26-32.

[39]郭连成,李卿燕.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安全相关性[J].世界经济,2005(11):54-63.

[40]李成,郝俊香.基于金融安全的资本流动：理论解读与中国实证[J].国际金融研究,2006(08):54-59.

[41]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课题组,黄志强.全球能源格局下我国的能源金融化策略[J].国际金融研究,2012(04):32-41.

[42]张承惠.新常态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新挑战[J].金融研究,2015(02):9-15.

[43]张红力.金融安全与国家利益[J].金融论坛,2015,20(03):3-14.

[44]罗素梅,周光友,曾瑶.金融安全、国家利益与外汇储备优化管理[J].管理科学学报,2017,20(12):1-18.

[45]马理,朱硕.跨境资本流动的原因及对金融安全的影响[J].武汉金融,2018(08):4-13.

[46]严海波.金融开放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J].现代国际关系,2018(09):18-26+62-63.

[47]张发林,张巍.均衡困境与金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问题[J].国际安全研究,2018,36(06):40-61+153.

[48]王广宇,韩亚峰,郭小丹.金融安全视角下不良资产形成机理研究——经济转型还是企业骗贷[J].国际金融研究,2019(02):87-96.

[49]吴婷婷,杨丹茜,江世银.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PLS模型的验证[J].国际商务研究,2020,41(01):85-95.

[50]卓丽洪.互联网金融与经济安全构成要素关联度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37(02):3-25.

[51]杨荣海,石健.“三元悖论”视角下人民币加入SDR后的金融安全分析[J].经济学家,2020(09):32-41.

[52]马理,姜楠,李甲翔.非法洗钱与资本外逃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21(03):67-79+135.

[53]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相关问题研究”课题组 ,李慎明.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当前我国金融安全现实性研究[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6(11):74-83+115-116.

[54]顾海兵,曹帆,张越,刘国鹏,姚佳.国家经济安全国际观察分析:美国、日本、俄罗斯[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9,11(03):5-15.

[55]宋爽,刘朋辉,陈晓.金融安全视角下的欧盟数字资产监管策略[J].欧洲研究,2020,38(02):61-80+6.

[56]王国实.对金融风险统计监测预警指标体系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0(02):199-200.

[57]宋海林,巴威.对我国金融风险状况的总体监测与政策建议[J].管理世界,2001(02):131-136.

[58]何旭彪.金融风险综合评估方法最新研究进展[J].国际金融研究,2008(06):63-68.

[59]宫晓琳.未定权益分析方法与中国宏观金融风险的测度分析[J].经济研究,2012,47(03):76-87.

[60]宫晓琳,杨淑振,胡金焱,张宁.非线性期望理论与基于模型不确定性的风险度量[J].经济研究,2015,50(11):133-147.

[61]杨子晖,陈雨恬,陈里璇.极端金融风险的有效测度与非线性传染[J].经济研究,2019,54(05):63-80.

[62]宫晓莉,熊熊,张维.我国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度量与外溢效应研究[J].管理世界,2020,36(08):65-83.

[63]陈梦根,赵雨涵.中国银行业跨境联系的测度与分析——兼论国际银行业网络结构的动态特征[J].经济研究,2019,54(04):49-66.

[64]白鹤祥,刘社芳,罗小伟,刘蕾蕾,郝威亚.基于房地产市场的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与预警研究[J].金融研究,2020(08):54-73.

[65]杨子晖,陈雨恬,谢锐楷.我国金融机构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与跨部门风险溢出效应研究[J].金融研究,2018(10):19-37.

[66]杨子晖,李东承.系统性风险指标是否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J].经济学(季刊),2021,21(02):617-644.

[67]陈湘鹏,周皓,金涛,王正位.微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的比较与适用性分析——基于中国金融系统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9(05):17-36.

[68]何青,钱宗鑫,刘伟.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度量——基于实体经济的视角[J].金融研究,2018(04):53-70.

[69]李敏波,梁爽.监测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金融市场压力指数构建和状态识别[J].金融研究,2021(06):21-38.

[70]王辉,梁俊豪.基于动态因子Copula模型的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度量[J].金融研究,2020(11):58-75.

[71]陈少凌,李杰,谭黎明,杨海生.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高维时变测度与传导机制研究[J].世界经济,2021,44(12):28-54.DOI:10.19985/j.cnki.cassjwe.2021.12.003.

[72]张颖,张富祥.分位数回归的金融风险度量理论及实证[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29(04):95-109.

[73]方意.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渠道与度量研究——兼论宏观审慎政策实施[J].管理世界,2016(08):32-57+187.

[74] Illing M, Liu Y. Measuring financial stress in a developed country: An application to Canada[J].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2006, 2(3): 243-265.

[75]Nelson W R, Perli R. Selected indicators of financial stability[J]. Risk Measurement and Systemic Risk, 2007, 4: 343-372.

[76]Lall S, Cardarelli R, Elekdag S. Financial stress and economic downturns[J].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8: 129-58.

[77]Europeo B C. Box 1: A Global Index of Financial Turbulence[J]. 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 2009: 21-23.

[78]Yiu M S, Ho W Y A, Jin L. A measure of financial stress in Hong Kong financial market–the financial stress index[J].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Research Note, 2010, 2: 2010.

[79]Balakrishnan R, Danninger S, Elekdag S, et al. The transmission of financial stress from advanced to emerging economies[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11, 47(sup2): 40-68.

[80]Müller J. Interbank credit lines as a channel of contag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2006, 29: 37-60.

[81]Billio M, Getmansky M, Lo A W, et al. Econometric measures of connectedness and systemic risk in the finance and insurance sector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2, 104(3): 535-559.

[82]Acharya V V, Pedersen L H, Philippon T, et al. Measuring systemic risk[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7, 30(1): 2-47.

[83]Rockafellar R T, Uryasev S. Optimization of conditional value-at-risk[J]. Journal of risk, 2000, 2: 21-42.

[84]Tobias A, Brunnermeier M K. CoVaR[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7): 1705.

[85]Acerbi C, Tasche D. On the coherence of expected shortfall[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2, 26(7): 1487-1503.

[86]Du Z, Escanciano J C. Backtesting expected shortfall: accounting for tail risk[J]. Management Science, 2017, 63(4): 940-958.

[87]Brownlees C, Engle R F. SRISK: A conditional capital shortfall measure of systemic risk[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7, 30(1): 48-79.

[88]Kole E, Koedijk K, Verbeek M. Selecting copulas for risk management[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7, 31(8): 2405-2423.

[89]Patton A J. Modelling asymmetric exchange rate dependence[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06, 47(2): 527-556.

[90]Oh D H, Patton A J. Time-varying systemic risk: Evidence from a dynamic copula model of cds spreads[J].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2018, 36(2): 181-195.

[91]王辉,朱家雲,陈旭.银行间市场网络稳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最优应对策略：政府控股视角[J].经济研究,2021,56(11):100-118.

[92]杨子晖,李东承.我国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基于“去一法”的应用分析[J].经济研究,2018,53(08):36-51.

[93]杨子晖,周颖刚.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与外部冲击[J].中国社会科学,2018(12):69-90+200-201.

[94]何德旭,苗文龙,闫娟娟,沈悦.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跨市场传染效应分析[J].经济研究,2021,56(08):4-21.

[95]党印,苗子清,张涛,冯冬发.大数据方法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中的应用进展[J].金融发展研究,2022(02):3-12.

[96]杨子晖,陈里璇,陈雨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基于非线性网络关联的研究[J].经济研究,2020,55(01):65-81.

[97]余博,管超.外汇风险传染网络测度与影响机制分析——基于静态和动态的双重视角[J].国际金融研究,2020(02):87-96.

[98]梁勇.开放的难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99]雷家骕.国家经济安全理论与方法[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100]郑汉通.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M].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

[101]刘锡良. 中国经济转轨时期金融安全问题研究[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